



海国图志

第三辑

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

专辑：意大利古典史学家莫米利亚诺

波里比乌斯在英国人与土耳其人之间

罗马城邦的危机与罗马历史学家：从撒路斯特到塔西陀

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

专论

论霍布斯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与公民哲学的关系

谈艺录

潘诺夫斯基论丢勒的《忧郁之一》

“为你披上高飞的羽翼”：代达路斯的传说与但丁的技艺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海国图志

第三辑

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

林国华 王恒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林国华,王恒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海国图志丛书)
ISBN 978-7-208-09075-0

I. 古… II. ①林…②王… III. 政治思想史-世界-古代-文集 IV. D0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1493 号

责任编辑 毛晓秋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出版

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

林国华、王恒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19,000
版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075-0/D · 1679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莫米利亚诺小专辑：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

- 3 莫米利亚诺小传 1
- 5 波里比乌斯在英国人与土耳其人之间(莫米利亚诺 撰
王 恒 林国华 译)
- 23 希腊思想中的海权(莫米利亚诺 撰 王 恒
林国华 译)
- 36 罗马城邦的危机与罗马历史学家——从撒路斯特到塔西
陀(莫米利亚诺 撰 王 恒 林国华 译)
- 57 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莫米利亚诺 撰 王 恒
林国华 译)

特稿

- 79 国会政治的童年(刘仲敬 撰)
- 103 人文之中：文中子的中国观(张 沛 撰)

战争与和平

- 116 重提《政治的概念》——论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重
版序(1963)(戴鹏飞 撰)

专论

- 132 恩典与自然：被赐福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思想
刍议(刘晨光 撰)
- 150 论霍布斯自然哲学、形而上学与公民哲学的关系
(王军伟 撰)

哲学与政治

- 180 柏拉图《书简》中的政治与哲学问题(王 恒 撰)
- 208 阿维罗伊《律法与哲学要论》研究(林国华 撰)

谈艺录

- 2 229 潘诺夫斯基论丢勒的《忧郁之一》(潘诺夫斯基 撰
蔡乐钊 译)
- 253 “为你披上高飞的羽翼”——代达路斯的传说与但丁的技
艺(朱振宇 撰)
- 267 机运、政治与德性：马基雅维利《曼陀罗》的三重世界
(戴智恒 撰)

莫米利亚诺小传

阿诺德·莫米利亚诺(Arnaldo Dante Momigliano),1908 年生于意大利,1987 年卒于伦敦,犹太裔,早年师从著名古典学家 De Santis。1936 年,28 岁的莫米利亚诺执掌都灵大学罗马史教席,后因意大利的“反犹法案”而移居英国,先后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执教,执掌以格罗特(Grote)的名字命名的希腊史教席,直到去世。在此期间,莫米利亚诺受聘定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和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开设研究生课程,执掌芝加哥大学“Alexander White 人文讲座教席”。在芝加哥大学,他结识了犹太裔政治哲学家 Leo Strauss,成为终生的朋友,并为后者的阿里斯托芬研究撰写书评。

莫米利亚诺以罗马史撰研究起家,后又延伸至希腊史撰、古代晚期政治史,对近现代史撰与历史哲学(维柯、孟德斯鸠、吉本、克罗齐等)亦有精深研究。作为一位古代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具备西方学院派最标准的古典研究资格,即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三种古代语言,不仅如此,他还同时用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阅读、撰写并发表论文。他的优点不仅在于对古代一手文献如数家珍,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自文艺复兴以降一直到现当代的各家门派的二手研究文献也拥有同等的熟悉程度,并能够给以充分的尊重,哪怕是一篇名不见经传的博士论文。——“学统”这个词在他的文字中拥有最生动的存在。欧美学界不仅公认莫米利亚诺为 20 世纪古代史领域的领袖,而且也是最博学的人。1974 年,莫米利亚诺被授予至高无上的大英帝国骑士团荣誉勋衔(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KBE)。

值得一提的是,莫米利亚诺的研究强项之一是公元 3-5 世纪,也

就是让勒南、吉本、孟德斯鸠感伤不已的古代晚期,这是一个衰亡与新生交替出现的时段,也是古代欧洲与亚洲几大民族与文明势力冲撞得最剧烈、最混乱的时段,不但政治与军事风云变幻不定,而且宗教与哲学教义也满天乱飞,世相纷乱,人心不稳。这个时段被古代史学界公认为最难啃的硬骨头,能够驾轻就熟地穿梭其间的学者寥若晨星,莫米利亚诺无疑是其中之一。而且,在笔者看来,他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心胸开朗地直面这个时段的充满失败、屈辱、背叛与变异的“犹太人问题”,表现之一就是**对 Flavius Josephus 这个犹太民族最具争议的大史家表示充分的尊重和倚重!**在“犹太人问题”研究方面,莫米利亚诺比 Eric Voegelin 更深刻,比 Leo Strauss 更有心胸。

4

莫米利亚诺最显著的学术风格是在古代史撰的研究领域中保持政治思想家的眼光。这一点在“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1940)中有所透露,他这样写道:“贡斯当、阿克顿、耶林和耶利内克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不是古代史学家。古代史学家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伟大的伯里(J. B. Bury),在他的《思想自由史》中也只把无足轻重的寥寥数页分配给了古代世界。这是古代史与最重要的欧洲主流思潮孤立开来的典型例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时代最好的古代史学家经常在技术上的聪明多于心灵上的深刻。”

莫米利亚诺不仅习得了一流的史学研究技术,而且也拥有深刻的用以沉思人世变迁兴亡的心灵,他赋予史学以灵魂,赋予政治学以身体。

林国华

2009-10-18 北京

波里比乌斯在英国人与土耳其人之间*

莫米利亚诺 撰

王 恒 林国华 译

—

事实上,如果将波里比乌斯(Polybius)描述为罗马帝国主义的信徒,这将使人感到无比惊讶。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带着19世纪的气息,而且,直到1858年,“帝国主义”这个词才第一次出现在牛津词典中。1813年,当本雅明·贡斯当撰写《论征服的精神》以反对拿破仑时,他尚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历史分析的先驱——其后,J. A. 霍布森(J. A. Hobson)教授和列宁同志完善了这种分析。波里比乌斯生活在一个将侵略和征服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正义战争”(bellum iustum)是罗马宗教概念,对于这一概念,古代历史学家们在对其进行历史判断时也深感犯愁。我们无法在罗马人所认为的不正义战争和我们所谓的帝国主义战争之间建立起精确的区分。波里比乌斯也从未在任何地方,对我们所谓的罗马帝国主义作出界定。他是最具智识洞见的原始资料来源;从他所描述的政治和战争世界内部获得了对这些事物的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从字面上反对波里比乌斯和他的历史概念,以便开始理解公元前300年之后意大利发生的事情。无论波里比乌斯还是任何其他古代资料都没有告诉过我们,这一独一无二的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 作者于1974年牛津大学“J. L. Myres 纪念讲座”(J. L. Myres Memorial Lecture)上宣读了此文。Oxford: Holywell Press, 1974。

即在征服西西里之前,军事服役而非贡款构成了罗马霸权的特征。我们不得不自己推算这样一种组织可能导致的后果。我们不得不了解到,联盟必须被保持,否则罗马就会失去对它们的控制。胜利的喜悦、掠夺、战利品、商业优势以及有利的移民条件对保持这一联盟是必要的。我们还不得不了解到,罗马统治阶层不仅必须在罗马,而且必须在它的盟国中防止社会冲突。战争的胜利对于盟国的领导者就像对罗马的领导者那样必要。因此,以军事义务为基础的意大利联盟,具有内在的征服热情并努力将这一热情付诸实践,这是帝国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

6 这些微不足道的洞见将在多长时间内令人感到满意,这是一个极其正当、但在此却与我们无关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波里比乌斯重新置于他的晚期希腊化背景中。罗马人将他们的保护扩展到了那些准备为他们服务的希腊知识分子。罗马人尤其需要获得那些他们正在征服的国家(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地理、政制和习俗方面的知识,他们知道希腊人是地理学和人种学方面的专家,并迫切地希望利用他们。罗马人还需要一种从希腊人的眼光出发,将他们的征服正当化的理论——并且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希腊人才有能力完成这样一种理论。

罗马人的这些需求和主张对希腊大城市(metropolitan Greece)和东方的希腊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吸引力。为了回应罗马人的要求,希腊人对凯尔特人、犹太人和波斯人(甚至帕提亚人)进行了全新的、更为彻底的研究。波里比乌斯、以弗所的阿尔忒米多鲁斯(Artemidorus of Ephesus)和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在罗马人的赞助下,根据罗马人的需要(如果不是罗马人的命令的话)研究了西方。伟大的古文物学家亚历山大·波利斯托(Alexander Polyhistor,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收集了关于犹太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许多个世纪之后,这些文献仍然被基督教作家们使用。以弗所的阿尔忒米多鲁斯、阿特米塔的阿波洛尼乌斯(Apollonius of Artemita)和查拉克斯的伊西多鲁斯(Isidorus of Charax)以及其他人对帕提亚人的研究先后让罗马人受益。在奥古斯都时代进行写作的斯特拉波,在自己的地理学著作中使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希腊地理学家为罗马帝国主义服务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这仅仅是异常复杂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而已。在公元前2世纪和1世纪,希腊人在认识罗马人和其他异邦人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他们试图通过观察他们的征服者以及其他被征服民族来努力理解自己。在希腊人的生命中,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境况,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以来如此。希腊人与其他具有不同起源的外邦人,如本都的米特拉达梯王、迦太基人和帕提亚人之间,被强加了一种重要的、休戚与共的感觉,尽管并没有真正的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新的境况。波里比乌斯分析了罗马政制和罗马社会,并提供了一种把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纳入其中的关于政治变迁的一般理论。波里比乌斯以混合政制的概念去理解罗马的境况,并以此取悦罗马人。西塞罗则把波里比乌斯的观念植入了他的《论共和国》中。其他希腊人,包括波西多尼乌斯,修正了社会冲突这一希腊传统概念,以适应意大利的内战情况:西塞罗和庞培得到了波西多尼乌斯的赞许。波里比乌斯由此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不得不试图根据希腊的政治和军事概念去努力理解征服者,但又不得不证明自己对主人有用。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处境。难怪我们时代一位独立思考过罗马帝国主义问题的学者,抛弃了波里比乌斯对罗马政制的分析,并认为这一分析堪称失败。我引证一段巴迪安(Badian)教授为波里比乌斯的新译本写的导论中的话:“从整体上看,明显试图为历史提供哲学支持的第六卷堪称完全失败,有关它的讨论几乎都是没有价值的。”不无偶然地,大约一百多年前,蒙森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7

二

因此,我们目前对罗马共和国史研究的概观似乎还算比较清晰。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始建构关于罗马帝国主义的模式。同时,我相信已经把波里比乌斯重新放回了 he 所属的那个含混的世界——那些不得不认真对待他们的罗马主人的希腊人的世界。

但这显然过于简略了。82岁高龄坠马而死的波里比乌斯,看起来并不满足于充当一位正派的、温和的历史资源的角色。在这次讲座中,

我想表达的毋宁就是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如果我们把波里比乌斯视为那些古人——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中的一员，我们可能会经常被他的幽灵所纠缠。隐藏在《罗马研究》背后是无用的，波里比乌斯的幽灵将会提醒我们一两个关于我们真正祖先的事实。实际上，泡赛尼阿斯（Pausanias）书中的一些片段表明，公元2世纪的希腊人仍然知道，波里比乌斯是一个难以安抚的幽灵。甚至在最时代错置的环境里，波里比乌斯的幽灵也从未停止侵扰、刺激和激发后人。

维柯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被波里比乌斯第六卷第56章中的一个句子吸引住了。波里比乌斯在这里认为，“迷信、惧神”（*deisidaimonia*）把罗马城邦保持在一起，而在其他民族中，惧神是一个被谴责的主题。“[波里比乌斯补充道]假如一个由明哲之人组成的国家是可能的，那么这一做法就没有必要了，但大多数人却是反复无常的。”维柯不懂波里比乌斯的希腊语，不明白“惧神”一词的含义，也没有注意该词的拉丁翻译。他认为波里比乌斯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哲人存在，那么宗教就是不必要的。他把这个观念作为一个迷人的标签在《新科学》中反复使用，以此来装饰自己的思想：“E quindi incomincia a confutarsi Polibio di quel falso suo detto: che se fossero al mondo filosofi, non farebbero uopo religioni.”（也正因此，他开始反驳波里比乌斯错误的格言：在一个这人的世界里，宗教将毫无用处。）如果没有对波里比乌斯的误解，就不会有《新科学》：这一情况或许开始引导我们将作为丰富牢靠的原始资料来源的作家和一个有激发性的幽灵区分开来。

你们可能会说，在18世纪的那不勒斯，任何幽灵都这样。但是在公元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呢？在那个世纪的最初年头，波里比乌斯缠住了佐西穆斯伯爵^[1]——皇家财政（*fiscus*）的古代辩护者——的心灵，

[1] Zosimus, 壮年时期大约在490-510年间，是东罗马皇帝 Anastasius I (491-518) 治下的财政大臣、历史学家，撰《新历史》（*Historia nova*），此书系罗马帝国史，共六卷，涵盖从奥古斯都登基到 Priscus Attalus 被废，跨度约400年。这部史书的最高价值在于，它的后两卷是除开教会史之外，惟一部从世俗政治军事史角度就公元5世纪帝国状况撰写的史书。——译按

这一结果至今仍是早期拜占庭史撰的最大谜题之一。佐西穆斯突然意识到,波里比乌斯的命运(*Tyche*)已经完全覆盖在自己身上。他,佐西穆斯,将成为记述罗马衰亡的波里比乌斯。麦加洛波利斯人波里比乌斯的名字,矗立在佐西穆斯史撰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个句子中,在整个古代和拜占庭史撰中,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的情形。其后,在第一章第57节中,佐西穆斯甚至在罗马兴盛的年数和衰亡的年数之间建立了一种精确的对应,波里比乌斯描述了罗马的兴起,而他则记述了罗马的衰亡。在最近哈特基金会(Fondation Hardt of Vandoeures)上的讨论中,我大胆地得出结论,认为佐西穆斯心目中罗马衰亡的年数包括了从尤利安之死到公元410年罗马被劫掠这段时期。但我真的不能假装知道波里比乌斯和佐西穆斯相互间交谈了些什么。波里比乌斯在君士坦丁堡的故事从未被人们说起过。波提乌斯(Photius)对波里比乌斯的沉默,或许要比在君士坦丁七世(Porphrogenitus)的赞助下对波里比乌斯的摘录和节选要危险小得多,也更少个人色彩,正是这点最终成为了原始文本失佚三分之二的原因。拜占庭学者的通常做法可以从教士希菲利努斯(Xiphilinus)对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的评注中清楚地看出来。尽管希菲利努斯必定花费了许多年的功夫在自己的斗室中辑录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他心仪的却是理性色彩更重的波里比乌斯,波里比乌斯从不轻率地记载那些奇闻轶事: οὐδαμῶς περὰ τοιούτων φησὶ (‘‘不语怪力乱神’’, III, p. 506, Boiss.)。

大约在1418年,伴随着人文主义拂晓的第一线曙光,波里比乌斯的幽灵决定重返意大利,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佛罗伦萨。在随后被发现的东西塞罗和李维的作品中有许多关于波里比乌斯的东西,这更加激发了人们对波里比乌斯的热情。但是,最具有感染力的一个信息片段或许出自普鲁塔克的《布鲁图斯传》,即布鲁图斯曾经在法萨卢斯战役的前夜认真地摘抄波里比乌斯的著作(4, 8)。普鲁塔克的《布鲁图斯传》于1400年由斯卡佩利亚(Jacopo Angeli da Scarperia)从希腊语译为拉丁语;另外或许还有一个更早的译本从由阿拉贡人传入佛罗伦萨。^[2]在17世纪初,卡萨本

[2] cf. R. Weiss, *Parola del Passato* 23, 1953, p. 336 and 339 n. 7.

(Casaubon) 还仍然相信,《古史撮要》(*Excerpta antiqua*) 是布鲁图斯辛勤辑录的成果,现在人们则认为《古史撮要》是 9 世纪的产物。

10 我们不知道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从哪里以及如何得到了一份波里比乌斯的抄本,并将波里比乌斯关于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及从伊里利亚战争和高卢战争到公元前 221 年的记述意译成了拉丁语。但是,在 1425 年之前数年,一份波里比乌斯史书前五卷的抄本就在佛罗伦萨存在了,由科波奈里(Antonio Corbinelli)所收藏。1425 年科波奈里死后,这份抄本落入了本笃会教士巴迪亚(the Badia of the Benedictines)的手中,并一直保存到拿破仑时代才被盜:从 1840 年起,这份抄本就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Londinensis, Museum Britannicum, Add. Ms. 11728)。值得注意的是,列奥纳多·布鲁尼只翻译了手头拥有的波里比乌斯抄本的一部分。没有一份现存的波里比乌斯抄本以第二卷第 35 章结束,由此可知,布鲁尼拉丁译本的结尾是布鲁尼自己的选择;而且选择的理由不难理解。在第二卷第 35 章,罗马人通过袭击获得了梅蒂兰姆(Mediolanum),伊苏布里(Insubri)的指挥官对安全感到绝望,任凭自己完全由罗马人摆布。这是新罗马——佛罗伦萨在与米兰(Milanese)的斗争中长达数十年的梦想。列奥纳多·布鲁尼还有一个优势,能够写一手漂亮的李维式拉丁语,以至于甚至在 18 世纪后期(the late Settecento),颇受尊敬的学者马奇诺尼(Lorenzo Mascheroni)在看到布鲁尼的波里比乌斯翻译时,还以为自己发现了遗失的李维史书第十一卷到第二十卷的一部分。直到最后一刻,他的朋友——一个或许更优秀的学者,才提醒了他。〔3〕

大约 1520 年,波里比乌斯看起来已经在佛罗伦萨宾至如归。波雷顿(Sicco Polenton)在帕多瓦知道了从佛罗伦萨开始的波里比乌斯复兴。1426 年波雷顿写作 *Scriptorum Illustrium Latinae Libri XVIII*(《著名拉丁作家辑录十八卷》,现在收入 *Codex Riccardianus* 121) 的第一稿时,仍然不知道关于波里比乌斯的任何信息,但是,在 1437 年的第二稿(B. L. Ullmann 已

〔3〕关于这个故事以及随后的情况,参看我 1973 年在哈特基金会论波里比乌斯的“波里比乌斯在西欧的复兴”(“Polybius’ Reappearance in Western Europe”)一章。

经把该稿子编辑得清晰易懂)中,他却高度称赞了波里比乌斯。在佛罗伦萨,从列奥纳多·布鲁尼就开始了对波里比乌斯和李维之间差异的讨论。波里坦(Politian)或许第一个从语文学的角度研究波里比乌斯。布兰卡(Vittore Branca)和斯托切(Manlio Pastore Stocchi)在他们最近编辑的值得高度评价的《二世纪拾遗》(*Miscellaneorum Centuria Secunda*)中,却没有注意到新文本最引人注目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尽管波里比乌斯不是波里坦在 *Centuria Prima* 中讨论的作家之一,但他却出现在 *Centuria* 新版第 38 节对“κατάρομα”^[4] 这个词的讨论中。最后,就像狄奥尼索蒂(Carlo Dionisotti)告诉我们的那样,卢切莱(Bernardo Rucellai)在 1505 年之前写的一本题为《罗马城邦》(*De Urbe Roma*)的小册子中,第一次让人们知道了波里比乌斯史书第六卷的存在。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对波里比乌斯史书第六卷含蓄但清晰地提及则是众所周知的。最迟至 1482 年,包括了第六卷的 *Excerpta antiqua* 已经可以在乌尔比诺(Urbino)看到,比斯蒂奇(Vespaiano da Bisticci)就曾见过,但明显是佛罗伦萨人最先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11

可以确信的是,首次将波里比乌斯史书一至五卷完整翻译为拉丁语的是另外一个圈子的人。该翻译是教皇尼古拉五世一个伟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试图把所有希腊历史学家的作品都译为拉丁语。波里比乌斯的翻译由尼科洛·佩洛蒂(Niccolò Perotti)进行,随后佩洛蒂就开始为贝萨里翁(Bessarion)服务。对波里比乌斯的翻译大约在 1454 年夏天完成。自从法比乌斯·皮克托(Fabius Pictor)在公元前 3 世纪末把希腊史引入罗马以来,尼古拉五世的这一翻译计划是史撰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但仍然没人意识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斯特拉波和阿庇安这些历史学家突然能够被有教养的人们阅读这一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果。或许革命没有立刻发生:它仅仅是对新思想模式的缓慢铺垫。沃拉特兰努斯(Raphael Volaterranus)知道佩洛蒂的翻译——他的 *Commentariorum Urbanorum Libri Octo et Triginta*(《三十八

[4] 意即“正当行为”,系古代斯多亚哲学学派的核心术语。——译按

卷雅评》)最初出现在 1506 年,但仅仅引证了波里比乌斯一次,即在第 30 卷中提及公元前 225 年高卢战争中的罗马士兵数量。对于一本超过一千页的百科全书来说,关于波里比乌斯的篇幅也实在太少了。或许更让人惊讶的是,沃拉特兰努斯从《苏达辞书》(*Suda*, 或 *Suidas*) 中获得了波里比乌斯的简短生平,而《苏达辞书》的希腊文版仅仅在 1499 年之前不久,才由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出版。对于人文主义编撰者而言,希腊语的百科全书比波里比乌斯本人更富吸引力。

佛罗伦萨人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波里比乌斯在马基雅维利这里达到了顶峰:马基雅维利从当代的旨趣重新解释了罗马的军事与政制结构。由于拉夫(Mrs. Christina Roaf)对卡瓦康蒂(Bartolomeo Cavalcanti)书信的权威编辑,我们现在得以知道,马基雅维利的这个信徒还曾试图把波里比乌斯介绍到费拉拉(Ferrara)。部分地由于缺乏精通希腊语的人才,¹² *Excerpta antiqua* 的整个编辑和翻译计划失败了。尽管 1550 年瓦尔切(Benedetto Varchi)给《佛罗伦萨史》(*Storia Fiorentina*)写的序言(Proemio)尤其表明,波里比乌斯一直存在于佛罗伦萨的史撰传统中,但是,当第一卷至第五卷的希腊文本于 1530 年在海格诺(Hagenau)第一次出版时,波里比乌斯研究的中心越过阿尔卑斯山已经是一个事实。随后, *Excerpta antiqua* 于 1549 年在巴塞尔出版。1609 年,卡萨本的巴黎版则宣告了对波里比乌斯研究在本质上变成了一种非意大利仅有的热情,这种热情风行于法兰西、尼德兰和英格兰。

保存在巴尔的摩的沃尔特斯艺术馆(Walters Art Gallery of Baltimore)的一份手稿,是幸存的少量稀罕而重要的证据,表明法国人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去了解波里比乌斯的新热情。古德谢莫(Werner L. Gundersheimer)最近已经提醒我们关注这份手稿。^[5] 文献证明,玛格丽特(L. Maigret)对波里比乌斯史书第六卷的广为人知的翻译乃是奉亨利二世(Henry II)的法兰西总管(Constable of France)蒙莫朗西(Anne de Montmorency)之令。在蒙莫朗西就任时,哈奇斯(Michel de Haches)就提醒他注意意大利的波里比乌斯

[5] *Studi Francesi*, 42, 1970, 462-467.

热。除了在将玛格丽特的翻译介绍给蒙莫朗西的信中对自己的提及之外,我们对哈奇斯一无所知。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543年。波里比乌斯已经渗透进那些正在重新改造欧洲的律师、政治家和战士当中。1566年,博丹称赞波里比乌斯是史撰中的伟大导师:“*intellegens, gravis, in laudibus parvus, in reprehensionibus acerbus ac veluti prudens legislator et bonus imperator... Videtur autem non minus philosophi quam historici personam induisse.*”^[6]

十年后,博丹通过对主权进行新的分析,摧毁了波里比乌斯的混合政制的基础。但是,如果1721年霍特曼(Hotman)的《法兰克高卢》(*Francogallia*, 1574)由莫尔斯沃斯(Robert Molesworth)译为英语并写了导论(这篇导论是真正的辉格党宣言),那么,必须承认,当时的英格兰对古罗马混合政制的神话充满了热情。爱德华·斯佩尔曼(Edward Spelman)——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英译者,被认为是1743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作者,这本小册子的题目是“波里比乌斯第六卷残篇……外加一篇把波里比乌斯的体系运用于英格兰政府的序言”。斯佩尔曼宣称:“在斯巴达、罗马和英格兰那样的混合政府下生活,是最简单、最安全和最幸福的。”人们不太注意的是,1747年这本小册子以更加响亮的标题重印了,新的标题是“罗马与不列颠宪制比较,包括波里比乌斯关于罗马元老院的奇异对话,以及一篇将他的原则运用于我们政府的长篇序言,这一切将重建真正的自由精神,并破除依附和腐化。致当前议会的年轻议员们”。当然,古罗马混合政制的一大优势是它可以很轻易地转变成威尼斯人的宪制,甚至更容易转变成旧哥特式政制。

曾描写过波里比乌斯性格的德莱顿(Dryden)先生,宁可生活在罗马或斯巴达,也不愿生活在威尼斯。当下社会的危机使得人们在两个重要方面更赞同罗马社会。首先,就像哈林顿说的那样:“鉴于我们为富人辩解并武装穷人,变成了我们的仆人的奴仆,他们为穷人辩护并武装那些足以

[6] “[波里比乌斯]深具辨识力,思考厚重,慎于褒扬,精于批判,酷似一位审慎的立法者和仁慈的皇帝……另外,他显露出来的哲人气度(性格)不逊于他的史家气度(性格)。”——译按

成为自由人的富人，他们成为了地球的统治者。”其次，就像米德莱顿 (Middleton) 在《西塞罗传》序言中说的那样，“当它的荣誉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家族，而是平等地、无差别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时”，罗马达到了完美状态。这些论辩者在多大程度上混淆了混合政制和权力分立的观念，是一个古老的难题。但我并不打算介入这一论争，英格兰和美利坚已经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著作，这些作者远比我更精通这一问题。但是，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我们必须对二者作出明确的区分。对波里比乌斯的不满产生了关于罗马史的新思想。在此，分界线是清晰的，尽管搞清楚从哪里开始远比知道在哪里结束要容易得多。分界线是哈林顿的《大洋国》和瓦尔特·莫利 (Walter Moyle) 的《论罗马政制》。《大洋国》提出了政治权力的财产基础这一问题，《论罗马政制》发展了哈林顿的观点，并从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更精细地分析了罗马统治阶层的转变：“[莫利发现]波里比乌斯从经验知道这些转变的连续性，但波里比乌斯不了解转变的真正原因，因为他简单地从道德理由中推论出这些转变……而不是从财产这一转变的惟一真实基础和权力的基础得出结论。”^[7]莫利重述了错误的概念：他相信李锡尼法 (Licinian Laws) 规定每个公民不得拥有五百英亩以上的土地。但莫利看到，根本问题在于，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束开始了罗马在意大利的霸权时代，并明确追随马基雅维利，宣称“罗马的斗争完善了他们的政府”。他正确地认识到殖民地的重要性，因为“通过这样把土地分配给民众，可以保持民众平衡”。18 世纪英国人对罗马共和国历史的重新评价——甚至当他们明显倾向于贵族制 (像亚当·弗格森那样) 时——保持了财产与权力的现实联系这一品质。我不太肯定这一分界线的终点是否涉及尼布尔，由于他对农业的兴趣，传统上通常把他与莫泽 (Justus Möser) 联系在一起，但他的英国前辈明显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遗憾的是，他早期关于“Natur der Römischen Staatsländereien”^[8] (约 1804

[7] Works, London 1726, I, p. 72. 关于参考文献，参看 I. Kramnick,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Cambridge, Mass. 1968.

[8] “论罗马国有土地”。——译按